

第壹章 緒論

本論文企圖驗證的中心命題是：冷戰後的中國是尋求向外擴張、還是自我防禦的國家？也就是說，中共的安全政策是屬於攻擊性的亦或是防禦性的？爲了檢視此一命題，本論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理論，並論證守勢現實主義能夠有效地解釋冷戰後中共國家安全政策的發展。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緣起

1991年蘇聯解體，改變了冷戰時期兩極對峙的世界秩序。而中國在鄧小平主政以來提倡「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綱領，摒棄意識型態的對立，以「改革開放」的政策致力於國家建設、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使中國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有顯著的提升；近年來中共更積極強化軍備、鞏固區域強權地位，讓人不能忽視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力。因此，探索冷戰後中國國際關係的理論成爲學界關注的課題，¹評估中共對國際安全的影響也是學者研究的焦點。²本論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冷戰後中共對外的安全行爲，並證明理論與實際之間的相關性，以作爲研究中共國際關係與安全政策的參考架構。

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對於國家安全的研究也是現實主義主要關切的課題。許多西方學者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解釋冷戰後中共國際關係與安全政策的發展。³傳統上，現實主義可分爲古典現實主義

¹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3rd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p. 10-11.

²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98), p. 1.

³ 採取這種觀點的西方學者很多，例如Thomas W. Robins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90s,"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lassical realism) 與結構現實主義 (structural realism, 或稱為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 國內學者也常以這兩種理論來探討中共的外交政策。⁴不論是古典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 其主張的國家主權與權力平衡, 皆與中共學者所提出的國際關係理論, 如綜合國力、世界格局以及國家利益說等等有相似之處。⁵所以, 以現實主義來分析中共的國際關係可以說是學界的主流。

然而, 傳統的現實主義, 尤其是結構現實主義, 對冷戰後中國對外行為的解釋確有不足之處。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後冷戰時期中國安全行為的轉變, 因為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內部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非外部的挑戰;⁶此外, 權力平衡的觀點認為國家會採取結盟的方式以對抗較強的一方, 但在中國的外交政策上卻無法得到證實。⁷因此, 本論文將沿著現實主義的發展脈絡, 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學說, 並驗證守勢現實主義能夠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 希望能藉以彌補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不足。本論文首先將分析冷戰後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知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 接著再採取個案研究 (case-study analysis) 的方式進行理論檢驗 (theory testing) 工作,⁸分別從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 90 年代以來南海爭議的過程中, 檢視中共的政策與行為是否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555-602.;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6), pp. 37-52; Denny Ro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Press, 1998).

⁴ 石之瑜對於國內現實主義學者曾有過分類, 見石之瑜, 〈解讀「大國外交」: 論兩岸的差異〉, 《政治科學論叢》, 第 13 期 (民國 89 年 12 月), 頁 148-153。

⁵ 黃碩鳳, 《綜合國力新論》(北京: 中國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閻學通以權力平衡的角度闡述中國外交環境, 並依此界定中國的國家利益, 見閻學通, 《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7 年); 其他現實主義的觀點可見, 張睿壯, 〈中國應選擇什麼樣的外交哲學?〉《戰略與管理》, 第 1 期 (1999 年 2 月), 頁 56-65。

⁶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19.

⁷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bid.*, p. 56.

⁸ 關於理論檢驗, 見 Arthur L.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7-20.

第二節 文獻回顧

一、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檢閱

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的概念最早起源於Robert Jervis的文章「安全困境下的合作」(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Jervis將軍事能力區分為攻勢與守勢兩種，認為當防守佔優勢時，國家皆採取防禦性的武器與政策就可以解決安全困境的問題。⁹Stephen M. Walt則主張以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來修正傳統現實主義權力平衡的觀念。Walt認為結盟是國家回應特定威脅而採取的制衡措施，而不是因為國際權力分佈的不均；而國家判定威脅是依對象的實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以及侵略意圖而定，彼此之間的意識型態、經濟或政治因素也不是形成聯盟的最重要考量。¹⁰所以，國家關心的是威脅的意圖而非能力，能力只是影響意圖的原因之一。

冷戰結束後，隨著國際環境改變的衝擊，若干現實主義學者否認權力競爭為國際的必然現象，對國際關係與國家合作持較樂觀的態度，於是延續上述學者的觀點，將傳統現實主義的假設結合攻守理論的概念，形成較具彈性與溫和色彩的守勢現實主義。

Jack Snyder首次提出「守勢現實主義」一詞，從此為學界所普遍採用。Snyder分析國家的「過度擴張」(overexpansion)會導致敵對聯盟與勢力的興起而與之對抗，並利用幾個歷史個案研究如德國、日本、英國、蘇聯與美國，解釋國家過度擴張的原因是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國內少數利益團體如軍隊、官僚系統或財團，會因為擴張而獲得極大的利益，因而鼓吹國

⁹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¹⁰ 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Spring 1985), pp. 208-248;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家必須向外侵略以獲得安全的迷思，並透過利益交換（logrolling）的過程使對外擴張的行為更加嚴重。¹¹Snyder將國內因素的分析融入現實主義的理論中，形成守勢現實主義的特點之一。

Charles L. Glaser則認為現實主義者可以是樂觀主義者，提出「條件性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一詞。Glaser從現實主義的假設出發，但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得到國家競爭與安全困境的結論，主張處於自助體系的國家，會以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安全困境，因為國家會意識到競爭所帶來的風險。而國家為了能溝通彼此的合作意圖，會採取「昂貴信號」（costly signal）的作法，以降低誤判所導致的衝突發生。¹²

Stephen Van Evera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很少會有戰爭發生，戰爭的起因大部分歸咎於國家錯誤的認知與偏好，許多現代戰爭都是「幻覺的戰爭」（wars of illusions）：國家自認會打勝仗、自認相對實力在下降、自認先發制人佔便宜、或自認攻擊較為容易因而發動戰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國家的侵略很少會成功，侵略者常常受到懲罰，即使侵略成功也很少帶來好處。Van Evera以更廣泛的角度探討戰爭的原因，不同於結構現實主義僅以有形、客觀的權力作衡量，認為有時決策者的認知比實際情況更為重要。¹³

最後，Jeffrey W. Taliaferro（2000）將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作更清楚的總結。Taliaferro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追求的是相對的安全而非絕對的權力，只在特定的條件下去尋求擴張，通常採取較為溫和、維持現狀（status quo）的外交政策；此外，國內因素與領導者的認知也會制約國家

¹¹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¹²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winter 1994/95), pp. 50-90.

¹³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2, No.4 (Spring 1998), pp. 5-43;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

表 1-1 守勢現實主義相關學者的論點

Jervis	Walt	Snyder	Glaser	Van Evera	Taliaferro
區分軍事能力為攻勢與守勢兩種，為守勢現實主義的概念起源。	提出威脅平衡修正傳統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著重於國家威脅的意圖。	強調國內政治的因素，形成守勢現實主義的特點。	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會彼此合作，並用昂貴信號來溝通意圖。	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戰爭大多起源於國家錯誤的認知與偏好。	國家追求的是安全，只在特定條件下尋求擴張，通常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對外在環境的反應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因此，Taliaferro希望能結合不同現實主義理論之長處，以發展出更具解釋力的國際關係理論。¹⁴本論文將守勢現實主義相關的學者及理論摘要整理於表 1-1。

二、中共守勢政策的相關文獻

許多學者皆同意現實主義較能解釋中國國際關係的發展，並以此來分析中共的對外行爲。例如國內學者邱坤玄對冷戰後中共外交政策的分析，是從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來探討中共的大國外交政策，認為中國一方面成爲國際多極結構中的一極，乃是國際權力結構下的必然；另一方面，中國國力的限制使其仍受到國際結構的制約，作爲一個大國的政策選擇面臨一定程度的瓶頸。邱坤玄認為，中共若在主觀上追求大國地位而忽略對自己客觀實力的評估，或其他國家誇大中國的實力，視之爲中國威脅，都違背了客觀事實。¹⁵

中共學者也不乏以現實主義分析國際關係的著作，但由於理論的實用性與政策的相關性，有許多政策性的著作，在此僅列舉現實主義觀點的代

¹⁴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128-161.

¹⁵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第 30 卷第 3 期（1999 年夏季號），頁 23-38。

表學者：例如，強調國家權力的黃碩鳳指出，所謂的綜合國力，是一個主權國家生存與發展所擁有的全部實力及國際影響力的合力；增強綜合國力的目標，是促發展求安全，追求國家各種力量的協調，增強綜合威懾能力，以此來維持更高水準與更加穩定的和平與安全。¹⁶閻學通（1997，1999）分析中共的國家利益與安全戰略，依外部環境、實力、對外政策原則及科技作為標準，認為中共目前在軍事力量上已能保證領土安全，在中期之內沒有大規模軍事入侵的威脅；而政治上已拋開意識型態的束縛，因而國家利益應首重於經濟安全，接著依次為安全、政治與文化利益。閻學通認為除了消極的維護國家安全、捍衛國家利益外，積極的在於提昇綜合國力以確保大國地位，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相對安全。¹⁷

Denny Roy（1998）綜觀中共國際關係的發展，也認為與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較為一致，然而，他也承認結構現實主義無法完整地解釋中共的對外行為，還必須要納入以下三種因素作為考量：第一、中國的歷史經驗深刻地影響了決策者對國際環境與中國地位的認知；第二、國內政治影響外交決策的制訂；第三、即使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中共內部也有不同的團體影響外交決策，必須經過辯論與建立共識的過程。¹⁸本論文將上述學者的著作摘要整理於表 1-2。

現實主義的理論與中共對外關係的發展較為一致，然而卻也有解釋不足之處，因此本論文認為守勢現實主義更能有效地解釋中共的國際關係。然而，由於守勢現實主義屬於新近發展的學說，應用在分析中共國際關係的著作目前並不多見，但是已有若干西方學者的研究顯示中共的外交與安全政策是採取守勢的姿態。舉例來說，Robert S. Ross 認為中共對外的政策

¹⁶ 黃碩鳳，《綜合國力論》（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92年）；黃碩鳳，《綜合國力新論》。

¹⁷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國家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

¹⁸ Roy,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p. 4-5.

表 1-2 現實主義學者對中共國際關係的分析

邱坤玄	黃碩鳳	閻學通	Roy
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角度探討中共的大國外交，認為中國必然成為國際多極結構中的一極，另一方面其國力仍受到國際結構的制約。	強調發展國家的綜合國力，增強綜合威攝能力，以此來維持更高水準與更加穩定的和平與安全。	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首重於經濟安全，也應該提昇綜合國力、確保大國地位，以維護國家安全。	中共的外交政策較符合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但也要納入領導者的認知、國內政治因素、與官僚利益團體的考量。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是保守的，即使對於國際現況不滿意，但還是希望能維持現狀，以保障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環境。所以，中共面對台灣問題與南海主權爭議，即使採取較為激烈的作法，但還是出於對維持現狀的要求。因此，Ross 不同意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不是由於中國科技與軍事的落後，而是基於中共不希望改變現狀的緣故。¹⁹

此外，Andrew J. Nathan也和Robert S. Ross以現實主義結合國家利益研究途徑來分析中國的外交政策，認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無異，主要在追求國家安全，但其姿態是防禦性的，並不謀求成為向外擴張的霸權。中國考量自身地緣政治、安全形勢、國家實力與弱點，而以長城與空城計作為戰略象徵：長城是弱勢的象徵，顯示出對入侵的敏感；長城又是力量的象徵，代表著經濟發達、文化技術的優越。空城計是軟弱與實力交相融合的另一個象徵，如中共以詐術來誇大自己有限的資源以達到威嚇敵人的功效。Nathan和Ross並透過理論聯結（theories of linkage）來說明中共的外交政策與國內政治如何相互影響。²⁰

Alastair Iain Johnston則可以為中共守勢的外交政策作一補充。Johnston

¹⁹ Robert S.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6, No. 2 (March/April 1997), pp. 33-44

²⁰ Andrew J. Nathan and Robert S. Ross,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分析中國是屬於國際關係中的現狀維持者（*status quo state*）、還是修正者（*revisionist*）。他從參與國際組織與遵守規範的程度，以及改變國際權力分佈的意願與行爲，來衡量中共是否試圖改變國際結構，以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結果Johnston發現中共加強了與國際組織的合作，其提倡的多極化世界只是主觀的目標，也並未積極結盟來對抗美國爲主的單極體系。此外，中共致力於經濟建設，反而更依賴與美國的合作以及維持穩定的外部環境。然而，Johnston對於中國是維持現狀者的結論，還是採取謹慎的態度，因爲他認爲還要將中國內部危機與台灣問題納入考慮。²¹Johnston屬於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不同於一般現實主義者的考量，更著重於分析認知因素的影響。本論文將上述學者的論點整理於表 1-3。

最後要注意的是，中共向來主張其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是屬於防禦性的，這點似乎與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不謀而合。中共防禦性的軍事政策，一方面如中共學者俞正梁所指出，是由於經濟發展爲中共現階段戰略的中心目標，爲了提升生產力，對外政策首要在於營造一個和平及有利發展的國際環境；²²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中共現階段的軍事力量僅能防禦自身之故。Paul H. B. Godwin曾對中共的軍力做出評估，認爲 1991 年的波灣戰爭使中共改變過去人民戰爭的軍事戰略，朝向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有限戰

表 1-3 學者對中共守勢外交政策的分析

Ross	Nathan 和 Ross	Johnston
中共外交政策是保守的，希望能維持現狀，以保障國內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穩定環境。	中國追求安全，並不謀求成爲向外擴張的霸權，而考量其自身的弱點，以長城與空城計作爲嚇阻，代表力量與軟弱的戰略象徵。	中共屬於國際關係的現狀維持者，依賴與美國的合作以及維持穩定的外部環境。然而還是要注意其內部危機與台灣問題的因素。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²¹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²² 俞正梁，《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爭作準備；而來自蘇聯威脅的減輕，也使中共從大陸性防禦變成保護海權的外圍防禦。然而，解放軍本身的缺點以及國防科技的落後，還必須在觀念、組織及作戰方式上進行革新與現代化，才能應付未來戰爭的需求。²³

儘管如此，近年來中共軍力的大幅提昇，確實也導致了其他國家的疑慮。國內學者張雅君（1999）認為，冷戰後中共面對中國威脅論的升高，以及美國、日本與印度的潛在威脅，因而在1995年公布國防白皮書說明其國防政策是防衛取向，企圖為其軍事現代化的發展做一界定；中共並與周邊國家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支持防止核武及武器擴散的國際條約，以降低西方與區域國家的敵意與誤解。但中共的軍事戰略由內陸走向海洋、強調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以及不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的政策，使其軍事政策在防禦與攻勢之間呈現模糊性，無法消弭其他國家的疑慮。²⁴

對於中共防禦性的安全戰略，Andrew Scobell則有不同的評估方式。Scobell主張中國歷來有一種「防禦崇拜」（Cult of Defense）的戰略文化。這種戰略文化並非綏靖的或好戰的，而是二元的：一方面受孔孟學說影響，避免衝突與自我防衛；另一方面則是屬於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使用軍事或攻擊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這種二元的戰略文化形成一種矛盾：中國領導人一邊以軍事手段達成國家目標，一邊合理化其行為是出於防禦或不得不然的行動（last resort）。所以，中國的防禦崇拜雖然極力避免戰爭，但一旦開戰，也會合理化戰爭為正義的或出於自衛的行為。²⁵然而，Scobell雖然主張中共的戰略文化是二元的，其分析卻偏重於心理與文化的層面，而忽略了在現實政治層面形成這種文化的基礎。

²³ Paul Godwin,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echnology, Doctrine,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in James R. Lilly and David Shambaugh, eds., *China's Military Faces the Future* (Armonk, N. Y.: M.E. Sharpe, 1999), pp. 39-63.

²⁴ 張雅君，〈世紀之交中共的軍事政策與亞太安全：防禦取向模糊性的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3期（1999年3月），頁25-44。

²⁵ Andrew Scobell, "The Chinese Cult of Defense," *Issues & Studies*, Vol. 37, No. 5 (September/October 2001), pp. 100-127.

表 1-4 學者對中共防禦性軍事戰略的分析

俞正梁	Godwin	張雅君	Scobell
主張經濟發展為現階段的首要目標，要營造和平及有利發展的國際環境，進而增加實力以利推動國際新秩序。	中共受蘇聯解體及波灣戰爭的影響，調整其軍事戰略與防禦縱深，然而解放軍必須進行革新與現代化，才能應付未來戰爭的需求。	中共發表國防白皮書闡述防禦性理念，並與鄰國合作以降低國際的敵意；但其戰略的轉變與不放棄對台動武的立場，仍無法消彌國際上的疑慮。	中國有一「防禦崇拜」的二元戰略文化，雖然極力避免戰爭，但也會合理化其訴諸戰爭的理由。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本論文將上述學者的論點整理於表 1-4。由上述的相關文獻中可以得知，以現實主義來研究中共的國際關係可以說是學界的主流，也較符合中國對外行爲的發展；另一方面，許多學者的研究也顯示出中共不論在外交政策或安全戰略上，皆呈現出防禦性的取向。然而，學界目前卻缺乏以守勢現實主義探討中共國際關係的著作，因此，有鑑於傳統現實主義在解釋上的不足，本論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希望能夠為冷戰後中共防禦性的安全政策，提供一個更清楚的分析架構。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以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因此試圖從冷戰後中共的對外行爲來回答下列的問題：

第一、中共對國際結構的認知是否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亦即國際結構是屬於良性的、國際安全是充足的？

第二、中共是否採取防禦性的、以維持現狀爲主的安全政策，而不是尋求向外擴張、試圖改變現狀的政策？

第三、中共的對外關係，例如 1995-96 年台海危機的行爲、以及處理南海主權爭議的方式，是否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假設，會採取嚇阻（deterrence）與昂貴信號的策略？

本論文研究的重要性在於：首先，就筆者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瞭解與接觸，最感興趣也最困惑的地方在於：要以何種理論來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與對外行爲？理論與政策的關係，對中共而言，帶有明顯的關連性。理論是用來做爲政策的指導，在評估內外環境條件後，選定某一最適合的理論作爲基礎，據以制訂各項配套政策，所以國際關係理論主要在爲中共的外交政策提供指導思想。²⁶

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奉行鄧小平思想作爲國際關係的指導理論，在和平與發展的前提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²⁷1989 年以後，中共歷經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國際孤立、東歐共黨國家與蘇聯解體等國際環境的變化，其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可以概括爲 28 字方針：「冷靜思考、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善於守拙、絕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做爲」。²⁸90 年代以來，中共更進行大國外交、睦鄰外交、伙伴外交，以及提倡新安全觀、世界多極化的外交政策。²⁹不論中共政策其中所帶有的宣示性質，筆者所要關切的是，要如何解釋中共提出這些理論與政策背後的原因與動力？³⁰因此，本論文嘗試以守勢現實主義作爲解釋的架構，來分析冷戰後中共安全

²⁶ 王緝思，〈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外交研究〉，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95-297。

²⁷ 魯毅、顧關福、俞正梁、傅耀祖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年），頁 10-11。

²⁸ 在鄧小平文選只有「冷靜思考、穩住陣腳、沈著應付」，見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21；而這 28 字方針爲中共官方一再地重申、引述，而成爲外交政策的依據，例如見唐家璇，〈當前形勢和我國對外關係〉，《解放軍報》（北京）（1994 年 3 月 7 日），第 3 版。

²⁹ 國內學者對這方面的研究不少，如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共大國外交格局〉；于有慧，〈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 43 卷第 6 期（2000 年 6 月），頁 1-19；于有慧，〈後冷戰時代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踐與挑戰〉，《中國大陸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2001 年 2 月），頁 57-76。

³⁰ 關於類似的探討，見 James N. Rosenau, "China in a Bifurcated World: Compe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Robinson an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p. 524-551.

政策的特色與性質。

其次，從 1992 年底開始，西方輿論與學界就掀起一場關於「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 的爭辯，中國從「中國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變成「中國威脅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Threat)。³¹主張中國會成為威脅的學者認為，中國由於國力的提升，將挑戰美國在東亞的地位，甚至在 21 世紀後期會取代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³²反對中國會是威脅的學者，則質疑中國成為威脅的能力與可能性，認為中國和全球經濟的互賴關係使其不會也無法造成威脅。³³至於中國的學者則主張，國力的發展與增強，與採取威脅他國的行爲沒有絕對的關係，就過去中國和平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防禦性的安全利益來看，中國的崛起是不會對世界造成威脅的。³⁴

這場論戰反映了當時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採取交往或圍堵政策的分歧，³⁵而類似的觀點也在學術界持續地討論，尤其為國內學界所關注。³⁶筆者無意去追溯中國威脅論的論點與脈絡，這也非本論文研究的範圍，但是本論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也許可以作為再評估中國威脅論的一種方式。

最後，在歷史與傳統文化上，中國被視為是愛好和平、反對使用武力

³¹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p. 3.

³² Nicholas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59-74;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7).

³³ Michael C. Gallagher, "China's Illusory Threat to South China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69-194; Ross, "Beijing as a Conservative Power;" Godwin, "The PLA Face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³⁴ 羅元錚，〈樹欲靜而風不止－中國威脅論評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7 期(1997 年 7 月)，頁 23-26；閻學通，《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年)；楊光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威脅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1999 年 4 月)，頁 15-19。

³⁵ David Shamba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operation or Confrontation?" *Current History*, Vol. 96, No. 611 (September 1997), pp. 244-245.

³⁶ 國內關於中國威脅論的探討，如董立文，〈中共的全球戰略與「中國威脅論」〉，《中國大陸研究》，第 39 卷，第 9 期(1996 年 9 月)，頁 27-46。

的國家；³⁷儒家學說也主張仁愛和平、以德服人，以王道而非霸道對待外族，因此中國歷來的對外關係都是防禦取向的，不尋求對外侵略、擴張。雖然這種文化研究的途徑並不在本論文的範圍內，但本論文希望能對中共防禦性的安全政策，提供另外一種思考的模式。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採取個案研究法，從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 90 年代以來南海爭議的過程中，檢視中共的政策與行為是否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個案研究是指研究者詳細地探討單一或數個案，檢視其中事件的過程或行為者的言行是否符合理論所推測。³⁸個案研究可以用來從事理論檢驗的工作，尤其在檢驗假設的解釋能力方面；此外，也能夠在資訊並不全面、不完整的情況下運用。³⁹對於研究中共外交政策而言，最大的困難在於其決策過程的資訊與透明化程度的不足，在這種情形下，個案研究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研究途徑。

本論文的個案研究類型，屬於「一致程序」(the congruence procedure)的個案研究法，⁴⁰在單一個案內進行多重的比較(multiple within-case comparisons)，⁴¹以檢視中共在個案中的政策作為是否與假設一致；若一致

³⁷ John K. Fairbank, "Introduction: Varieties of Chines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Frank Kiernan, Jr. and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Ways in Warfa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1-26.

³⁸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1997), P. 29.

³⁹ *Ibid.*, p. 55.

⁴⁰ 「一致程序」的個案研究法可以在單一個案或數個案之中作比較研究，需要理論的特定條件基礎來預測結果的發生；研究者首先在個案中建立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與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的關係，接著觀察在特定的自變數情況下，個案的依變數是否與理論所預測的依變數是否一致，結果一致的話代表因果關係越強、理論也越成立，見Alexander L. George and Timothy J. McKeown,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Robert F. Coulam and Richard A. Smith, ed.,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2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1985), p. 30.

⁴¹ 「單一個案內的多重比較」指研究者在一個案中設定數個觀察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重點，檢視

的話，則代表理論通過了檢驗。

至於本論文選擇的個案：1995-96年台海危機、以及90年代以來中共的南海爭議，可以說是研究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台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是中共90年代以後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兩者也都涉及了主權的爭議；此外，台海危機發生的時間較短暫，南海衝突則延續了較長的時間，可以作為中共短期及長期政策作為的比較。

第五節 研究範圍、限制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研究的主題是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時間範圍主要界定在1991年冷戰結束後迄今，特別著重於1995-96年台海危機發生的期間；至於南海爭議的部分，則會稍微回溯到1970、1980年代的歷史背景。

本論文研究中共的國家安全政策，首先著重的是軍事安全的面向，所指涉的安全意涵屬於傳統現實主義對於安全研究的定義。正如Stephen M. Walt定義安全研究：「乃是關於戰爭的現象…為對軍事力量的威脅、使用與控制的研究，探討何種情況下武力的使用較為可能，武力使用的方式對個人、國家與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國家採取哪些政策去準備、避免或從事戰爭」。⁴²本論文對中共安全政策的探討，即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對安全研究的界定基礎上。

雖然冷戰結束後，學界開始重新思考安全的內涵，並擴展安全研究分

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是否一起呈比例變化 (covary)，如果與假設一致的話，理論也就通過的測試，見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pp. 61-63.

⁴²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June 1991), pp. 212; 關於對Walt的反駁，見Edward A. Kolodziel, "Renaissance in Security Studies? Caveat Lect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6, No. 4 (December 1992), pp. 421-438.

析的深度與廣度；⁴³對安全的認識從傳統的軍事領域延伸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非軍事領域，範圍亦從國家擴大到整個國際社會，挑戰了傳統現實主義的安全概念並指出其侷限性。⁴⁴然而，軍事安全仍是眾人關切的議題，並不因此而失去了重要性，只是不再是安全研究唯一的重心；⁴⁵此外，安全研究的範圍朝水平與垂直的方向擴大，使其議題分歧且缺乏學術上的一致性，難以解決實際存在的重大問題。⁴⁶是故，本論文對安全研究的重心與在個案的選擇上，仍是延續傳統現實主義的脈絡，以國家的軍事安全面向為主。

再者，對於研究中共政策而言，最大的困難莫過於官方資料取得的不易，尤其本論文的研究範圍涉及中共敏感度較高的國家安全領域，其決策過程的資訊與透明化程度不足。爲了克服這一限制，本論文除了選擇個案研究的方法來加以彌補外，也會盡量收集中共官方的聲明、高層領導人的談話、政策白皮書、報紙資料、以及各類專書與期刊，來加以彙整、分析。然而，對於中共一手資料與決策過程資訊的缺乏，可能使本論文的分析不夠完整、周延，這是本研究最大的侷限之處。

最後，在本論文的章節安排方面，總共分爲 6 章：第壹章爲緒論，陳述研究的動機與重要性、相關文獻的檢閱、以及研究的方法與範圍。第貳章介紹現實主義理論的演進和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論點。第參章分析冷戰後中共對國際環境的認知與國內因素的影響。第肆章、第伍章則是本論文

⁴³ Keith Krause, "Broadening the Agenda of Security Studies: Politics and Methods,"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0, No. 2 (October 1996), pp. 229-254

⁴⁴ Muthiah Alagappa將安全分成 4 個要素來探討，分別是指涉的對象 (referent)、核心價值 (core value)、威脅的類型 (types of threats) 以及獲致安全的途徑 (approach to security)，見 Muthiah Alagappa, "Introduction,"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17.

⁴⁵ 陳欣之，〈國際安全研究之理論變遷與挑戰〉，《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4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頁 19。

⁴⁶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pp. 213, 222-223; 另外對其他非現實主義安全研究途徑的批評，可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49; Mearsheimer, "A Realist Repl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92

的個案研究部分，分別從 1995-96 年的台海危機、以及 90 年代以來南海爭議的發展過程中，檢視中共的政策作為是否與守勢現實主義的假設一致。第陸章則是本論文的結論，對守勢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之關連性作一綜合性的評估，並提出相關政策的因應措施。